

动节奏，也具有被其他现实打乱和打断的、非连续性的可能性。每一历史时代中的一切层面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

因此，在现实历史中不存在黑格尔式的同质化的同时代性，只存在非同质化的同时代性。罗兰·巴尔特在谈论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思考”时一言以蔽之：“同时代性就是不合时宜。”而尼采的原话是：“这思考本身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试图把这个时代引以为傲的东西，把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无能和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被历史的狂热所消耗，但我们至少应该对它有所意识。”^①我认为这种不合时宜的思考，就是对马克思曾经指出的精神生产（或知识生产）相对于一般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自觉。

从唯心史观出发，一种思辨的、同质化的同时代性强迫我们接受某种“时代精神”、某种“历史潮流”、某种“政治正确”。阿尔都塞的立场是不合时宜的，是政治不正确的：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流面前，他宁可去寻找“从左面批判斯大林主义”这种“近乎不可能的立场”；在把马克思黑格尔化的主流面前，他宁可去追寻历史上真正的“唯物主义潜流”。他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从一种唯物史观出发，那么真正介入时代，而不是成为这个时代附赘悬疣或虚假装饰的理论思考，必须时刻对一个时代的主流和政治正确——像尼采说的那样，对“历史的狂热”——“有所意识”。如果看看人类思想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理论上的真正的同时代性通常是反潮流的。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作为我们同时代人的阿尔都塞

吴子枫

感谢林凌的邀请。刚才陈越老师提到阿尔都塞的不合时宜，也就是阿尔都塞与他自己时代的非同时代性。这种非同时代性来自他的思考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拉开的距离。阿尔都塞的不合时宜，是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眼中的不合时宜。

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从阿尔都塞的思考总是在直面他的时代的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和共产主义运动危机——这个角度来看，他又恰恰与自己的时代保持了高度的同时代性。悖论的是，阿尔都塞的这种同时代性，并没有因为他所生活的时代变成历史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尽管从历史时间来看，阿尔都塞已经是我们的非同时代人了，但在理论上，他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如何解释这种悖论呢？在我看来，一切同时代的非同时代性，或非同时代的的同时代性，实

^① 转引自[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际上都来自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平衡，来自一个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各层级发展的不平衡，来自一种社会形态在全球空间中发展的不平衡（因为在上述所有领域或空间，时间都不是均质的）。作为我们历史非同时代人的阿尔都塞，今天仍然能在理论上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恰恰来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平衡，来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来自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

从历史时间来看，阿尔都塞生于1918年，在年龄上比中国“知青”一代年长很多，但他的理论成熟期在“文革”前后，他1960年代、1970年代的理论处理的问题，恰恰是“知青”一代在1980年代面临的问题。所以严格说来，阿尔都塞是中国“知青”一代在理论上的同时代人。但鉴于“知青”一代在1980年代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今天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且仍然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认为，从理论上来说，阿尔都塞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同时代人。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发言，我想就阿尔都塞作为我们理论上的同时代人简单谈两点：（1）“从左面”看待和总结当代中国革命实践；（2）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前任务，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今天的中国怎么办。

一、阿尔都塞与“从左面”的总结

谈到对当代中国革命实践和总结，我们都会注意到一种历史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来自历史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有差异的重复”——历史中发生的事情不会完全重复，但历史中却有一些在形势上高度相似的时刻。

比如，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同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和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处境，就有某种相似之处。这两批知识分子对那种处境的反应，也有某种相似性。从微观上看，他们的具体情况肯定有所不同，但放到整个国际共运史的大背景上看，却又高度相似：他们都面临同一种困境，即如何面对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挫折或失败，如何面对日益僵化、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苏联和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来说，是如何面对斯大林的实践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如何面对毛泽东的实践和教条化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道路与苏联道路有很大的不同）。

这两批知识分子对上述相似的处境有大致相同的反应。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和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普遍对斯大林主义表示失望，由此产生了对“个人崇拜”时期声势浩大的批判。这场批判运动，无论在苏联，还是在欧洲，在当时都被“体验”为一种巨大的“解放”。然而，半是由于缺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半是由于现在还没有得到细致研究的政治经济上的自发倾向，这场批判运动所“解放”的，只是自发地存在于所有知识分子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而无论在苏联，还是在欧洲，这种批判主要是“从右面”展开的。具体说来，就是都在理论上采用了人道主义的形式：一方面，用人道主义谴责斯大林主义——“有些人不仅把斯大林应负的罪责和错误，而且把我们自己的失望、错误和混乱，统统推到斯大林的身上”^①；另一方面，用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借用阿尔都塞当时的说法：

^① [法]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页。

从前，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人道主义”，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伦理的、唯心主义的解释，求助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家、前卫的宗教人士（某些天主教徒）所干的事。从那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自己也开始这么干了。^①

这些话完全可以用来描述 1980 年代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在受挫的情感和受伤的情绪的本能推动下，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党内和党外知识分子，基本丧失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历史与现实的能力，任由“人道主义”的特洛伊木马进入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的大门，从而拱手交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

阿尔都塞对苏共二十大之后法国共产党人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陷入上述那种状况进行了精彩的分析，^②这里不复述。但他的分析思路也可以用于 1980 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从历史角度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缺少真正的理论研究传统。20 世纪，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一定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革命的阶段性胜利。但这种胜利的代价之一，是逐渐把理论原则同战略战术相混淆，对理论研究抱实用主义态度。当世界历史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时，就缺乏新的有效理论武器。阿尔都塞说过，共产党人也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只需要政治信念，而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则需要从理论上搞清楚这种信念的可靠基础，从而需要很高的理论素养。如果缺少理论研究传统，就会要么重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要么陷入理论上的自发主义，任由新引进的各种理论支配自己。

从现实角度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知识分子与先进的工人阶级缺少有机联系。尽管改革开放之前有下放运动、上山下乡运动，但这些运动更多地是把大批知识分子“赶到”乡村，所以这些知识分子更多地是在落后的乡村与乡村小生产者的生活相接触，这自然使他们更多地染上小生产者的自发意识形态，更多地从小生产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从向工农兵学习的“金箍”中“解放”出来，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比之前受到更多优待，更与无产阶级工人（如下岗工人）、后来出现的新工人（即农民工）失去有机联系。总之，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地位使他们感觉不到有向工人阶级方面去寻找出路的切身需要。同时，由于中国的工人阶级本身在历史上是被动地由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出来的，相对缺乏真正的阶级斗争经验，没有得到政治锻炼和理论培养，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也没有生产出属于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

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 19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实存在双重脱离倾向：一是在引进西方思想的过程中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脱离；二是与人民中代表历史先进方向的劳动者相脱离。这一切导致思想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度几乎消失。所以自 1980 年代之后，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是多少有些实用主义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从右面”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而这种批判通过人道主义的中介，走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背离。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甚至世界思想史的角度来看，1980 年代中国思想界其实是在“倒

① [法] 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批评和自我批评》，吴子枫译，载徐志伟、乔焕江主编：《扎根》（第二辑），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版，第 334 页。

② 参见阿尔都塞给《保卫马克思》所写的“序言”，详见 [法]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 3—13 页。

退”，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平衡，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却让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进步”的幻觉。

在这种状况下，阿尔都塞“从左面”批判“斯大林偏向”，利用这种“解放”的契机打破教条主义，进一步在理论上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以及由此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尤其值得我们注意。^①因为在我看来，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缺少“从左面”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批判和总结。

如今，经过改革开放之后四十多年的发展，在国内国外新的不平衡状态下，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受益者和幸存者，中国有条件也有责任“从左面”对本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批判性总结。

二、阿尔都塞与葛兰西的分歧，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怎么办

我想谈的第二点，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前任务，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今天的中国怎么办。这是一个大问题，超出我的能力。但既然这是本次会议的主题，无法回避，我就想从阿尔都塞与葛兰西的分歧出发来谈谈自己的个人看法。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各自的贡献，但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我的感觉是，以往人们更多地强调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理论的继承，而没有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分歧，或者说，没有注意到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批判。这种忽视非常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关于阿尔都塞与葛兰西的复杂关系，以及他对后者的批判，我在讲稿《领导权、法权和共产主义战略问题：从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批判谈起》中有过梳理和讨论，由于时间关系，这里无法全面展开。我只想简单指出他们之间的三个分歧。

第一个分歧涉及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上层建筑问题。阿尔都塞指出，在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所有著作中，谈论上层建筑的地方微乎其微，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直缺少关于上层建筑的理论。而“葛兰西在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功劳”，就是把上层建筑“如此明显地作为头号问题提了出来，以反对斯大林经济主义”。^②问题在于，尽管葛兰西强调了上层建筑的重要性，有助于批判机械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但他在谈上层建筑时就只谈上层建筑，除了一些暗示之外，下层建筑完全缺席，以致上层建筑成了“一种幽灵般的存在”^③。而如果完全遗漏下层建筑，只剩下上层建筑，我们就无法在一种社会形态的整体中思考各要素的有机联系，也就无法解释上层建筑在与下层建筑关系中的存在和功能，无法解释上层建筑在下层建筑的再生产中、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如果不理解这些作用，我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有上层建筑存在。

所以在阿尔都塞看来，尽管葛兰西成为“第一个真正对上层建筑现象、对国家和各种意识形态感兴趣的理论家”^④，尽管他提出上层建筑会渗透到下层建筑中，但这种“渗透”并没有得到

①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保卫和发展，是在与当代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唯心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交锋和斗争中进行的，所以他的理论能为我们提供对各种唯心主义理论的洞察力和免疫力。

② [法] 路易·阿尔都塞：《怎么办？》，陈越、王宁泊、张靖松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2页。

③ 同上书，第50页。

④ 同上。

真正思考，或者说“这种渗透本身也是从上层建筑的观点出发被思考的，我们并非真的知道这个上层建筑渗透到了什么别的层面”^①。

以上就是阿尔都塞和葛兰西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所在。葛兰西谈上层建筑就只谈上层建筑，孤零零的一个上层建筑，根本没有把它与下层建筑联系起来。阿尔都塞则指出，只有联系下层建筑并从下层建筑运行条件“再生产”的观点出发，才能理解上层建筑的存在和变革。他的理论从“再生产”的观点出发，把以国家为中心的上层建筑思考为保障生产关系再生产、从而保障下层建筑再生产的体系。这样一切都得到了说明，为什么会有上层建筑，它是如何渗透到下层建筑中的，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等等。^②

也正是在明确了这一根本分歧之后，我们才会懂得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与葛兰西的领导权机器理论有多么大的不同，尽管前者在公开发表他的相关理论时曾向后者致敬（但在相关的未刊手稿中则是另一种态度）。

第二个分歧涉及共产主义革命战略问题。为什么葛兰西在讨论上层建筑时出现如此重大的理论失误？^③因为实际上葛兰西的思考“与其说是在表达一种国家理论，不如说是在探索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路线”^④。这个路线就是以阵地战闻名的替代性战略。

在解释为什么不发达的俄国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发达的西欧却没有爆发相同的革命时，葛兰西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分的框架下关于俄国与西欧诸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平衡发展的分析的确能给人以深刻启发。但当他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构想一套国家理论，并据此提出一种革命战略时，就出现了某种偏差。因为他根据上述历史性分析，在理论上假想了不同的国家类型，其中两个极端分别是专制国家（警察国家）和伦理国家：前者完全靠强力维持，领导权几乎不存在，例如沙皇俄国，强力以压倒性的方式占上风，而市民社会是凝滞的，征服这样的国家，只要正面出击的运动战；后者的强力尽可能地缩小而领导权尽可能地放大，以至于完全靠领导权维持，强力几乎不存在或至少不必出面，征服这样的国家，就要有一场持久的阵地战，一步步去攻克作为其防御工事和堑壕的市民社会。

我认为在这种构想中，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定的阵地战战略和关于意大利形成统一民族国家的难题，纠缠着葛兰西，使他对国家的思考产生了极大的变形，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国家的暴力相应被看成了实际上的零，因为它完全被整合进了领导权-后果中”^⑤。所以葛兰西的阵地战理论和国家理论给人一种印象（因为他虽然说过阵地战是运动战的前期准备，但同时又说“运动战日益转变为阵地战”），似乎现代君主及其有机知识分子可以通过持续不断的知识和道德改革，一步步地攻克作为国家防御工事和堑壕的市民社会，扩大领导权，从内部征服国家。也就是说，“国家政权的夺取，从而阶级专政，可以采取一种从内部、从其阶级统治

① Louis Althusser, “Marx dans ses limites”, in François Matheron, ed., *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 Paris: STOCK/IMEC, 1994, p.501.

② 参见 [法] 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③ 正如阿尔都塞所说，葛兰西在马基雅维利四百年之后，在马克思七十年之后进行思考，却仍旧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一个没有下层建筑、没有生产关系和再生产的空白地带，这简直是一种咄咄怪事。详见 [法] 路易·阿尔都塞:《怎么办?》，第 125—126 页。

④ Louis Althusser, “Enfin la crise du Marxisme!”, in Yves Sintomer, ed., *Solitude de Machiavel*, t. I, Paris: PUF, 1998, pp.276—277.

⑤ Louis Althusser, “Marx dans ses limites”, in François Matheron, ed., *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 Paris: STOCK/IMEC, 1994, p.505.

形式内部占据阶级对手阵地的形式”^①。然而，这显然严重低估了资产阶级镇压性国家机器（暴力机器）的力量，也严重低估了各资产阶级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勾结和相互支援。

在阿尔都塞看来，尽管葛兰西有独创性的领导权概念，但他在谈领导权时，实际上是在谈阵地战，谈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在于，既然葛兰西发明了一些提法，“把一种现实化约为另一种现实，用一个问题置换另一个问题”，而且“这些化约和置换当中最严重的就是国家化约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置换了国家”。那么在葛兰西的国家理论和阵地战构想中，得到思考的就一直是征服市民社会的问题，征服国家的问题压根就没有被提出过，因为国家被简化为市民社会了。^②所以我们必须重新面对这个问题。

同样，因为葛兰西的国家理论和阵地战一直没有离开过上层建筑领域，而是在他所有的推理中，把下层建筑，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性”的东西——剥削、被剥削的条件以及它们的再生产——一笔勾销了。所以，我们也必须把这些被勾销的东西重新考虑进来，否则就像阿尔都塞所说：

一种工人运动的战略竟然如此轻率地把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性”的东西撇开不谈，我们能够有片刻的工夫严肃对待它吗？那是一种玩票心态。也可能是一种冒险主义。^③

必须对这种冒险主义进行批判，因为正是这种冒险主义的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危机的时刻，被欧洲各共产党“从右面”进行了解读，并被当作解决危机的办法，于是形成了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路线，即通过民主和平的方式开辟通向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阿尔都塞认为，葛兰西的理论之所以能被用来证明这一战略的合理性，是因为他的理论确实为欧洲共产主义提供了“从右面”进行解读的可能。但除非“在某个历史时期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度过”，剩下的少数国家才有可能采取某种全新的形式（如民主和平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而像欧洲各共产党那样，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贸然采取这种战略，就是“在形势上犯错误”，甚至是“违反规则以罪恶的方式篡改形势”。^④

在对欧洲共产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阿尔都塞力图“从左面”阐释葛兰西的阵地战，即把阵地战还原为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这不仅是因为葛兰西本人说过“先前运动就是‘全部的’战争，等等，而现在被它们降低为只是‘局部的’要素”^⑤。这还因为阿尔都塞通过自己“再生产”观点下的上层建筑理论，把葛兰西限定在上层建筑中的斗争，与下层建筑中的斗争联系起来，从而把政治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和经济的阶级斗争，还原为无产阶级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总斗争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总斗争中，阿尔都塞承认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经常走在其他斗争的前面，但政治的阶级斗争具有优先性，同时政治的阶级斗争又必须深深地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

① Louis Althusser, *Les Vaches Noires*, Paris: PUF, 2016, p.320.

② [法] 路易·阿尔都塞：《怎么办？》，第138页。

③ 同上书，第127页。

④ Louis Althusser, *Les Vaches Noires*, pp.321-322.

⑤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9页。

只有将阿尔都塞与葛兰西在这方面的分歧讲清楚，我们才能把阿尔都塞与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与打着各种激进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区分开来；也才能理解阿尔都塞是在什么范围内坚持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战线与军事战线的区分，并贯彻“和最杰出的对手交锋”^①这一阵战地内部的正确战术的。

第三个分歧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理解和阐释。具体说来就是，葛兰西“用同一个术语（即实践哲学）合并了历史科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并将这种统一思考为一种‘世界观’，或一种总之可以同古老的宗教相比的‘意识形态’”^②。也就是说，葛兰西用“实践哲学”这单独一个名字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把它们混合、混淆了起来，并最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于哲学、世界观或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认为，这种构想的好处是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科学的关系，乃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化约为一种哲学了。

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上述总构想几乎始终没有变过。与之相反，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理解发生过很大变化。1960年代初，阿尔都塞沿用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认为马克思既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又创立了一门新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哲学，被他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知识生产的理论”，甚至一度被认为也是“一种科学”。直到1967年，他才承认自己“关于哲学是理论实践的理论的定义是片面的，因而是不确切的”，是犯了理论主义偏向的错误。^③而通过1969年的《论再生产》及其后续研究，阿尔都塞开始倾向于认为，马克思只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科学，但没有创立一门新哲学，并且只有这门历史科学才是理解哲学的基础，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意识形态的清晰认识，而“如果没有对意识形态的清晰认识，就不可能建立起一种关于哲学的理论”^④。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1970年代被不断重复和修正的关于哲学的新提法，以及他至死都坚持的关于哲学的新定义：“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中的阶级斗争。”^⑤

在这样的定义中，哲学不再是关于某个对象的客观认识体系，而是一种没有对象、只有目标和赌注的斗争，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它属于上层建筑领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小分队。哲学斗争的目标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哲学斗争的赌注是一切社会实践，首要的是科学实践和政治实践——因为哲学可以通过对哲学本身进行干预，远距离地“调整或校正”那些实践。

根据这个新定义，就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只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实践，即站在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上的理论斗争。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只不过表达了这种斗争的立场和方法。不存在辩证法的规律，只存在无数辩证的论点，这些辩证的论点（以“……优先于……”的形

①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文选》，李鹏程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译文有修改。

② [法] 路易·阿尔都塞、[法] 艾蒂安·巴利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译文有修改。

③ 同上书，第2页。

④ [法] 路易·阿尔都塞：《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吴子枫译，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第279页。

⑤ [法] 路易·阿尔都塞：《答约翰·刘易斯》，载[法] 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9页。译文有修改。

式)可以为正确的革命实践开辟道路。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问题，阿尔都塞最后提出必须放弃自己早期关于“马克思通过‘双重的断裂’同时生产了一门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和一种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表达，因为这会“误导我们”。^①实际上，“在哲学一词的经典意义上不可能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中带来的革命，在于以新的方式，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知的哲学的真实性质，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来实践哲学”^②。

尽管随着研究的深入，阿尔都塞逐渐否认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始终承认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存在，只不过关于这门科学的“对象”，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表述。最终他认为：“这门科学的对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而非——像恩格斯本人在某个瞬间所认为的那样、像太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政治经济学。”^③

这就是阿尔都塞与葛兰西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理解上的分歧：葛兰西最终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阿尔都塞最终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并且这门科学的对象既不是社会学，也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阶级斗争的规律”。

阿尔都塞与葛兰西的分歧当然不止上述三点，但这三点分歧显然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它们是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无法回避的。当然，我今天发言的重点不是阿尔都塞对葛兰西（或葛兰西主义）的批判，而是想通过他们的分歧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一些索引。我想强调的是，一方面，阿尔都塞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他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乃至形形色色的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和发展，又使他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或官方马克思主义。我觉得在当今的理论环境和政治环境中，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它向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真正的挑战。

回到我们的会议主题：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怎么办？

我个人的看法比较简单：必须借助或经由阿尔都塞，进行一场理论的迂回，重新回到马克思，重新思考那些马克思主义经典问题，重新开放马克思主义，恢复它作为一门革命的科学的活力。

具体怎么办？继续翻译阿尔都塞的著作，尤其是他自我批评之后的著作，尤其是近些年整理的几部1970年代的遗稿。《黑母牛》《写给非哲学家的哲学入门》都已经译完，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应该能出版。我相信，它们的出版一定会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有所推进。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也不是为了阿尔都塞甚至马克思。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我希望通过翻译和研究，让阿尔都塞真正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让他和我们一起，从社会主义中国的远景出发，共同思考和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我想，这也是丁耘老师所说的“阿尔都塞的真正复兴可能要在到达中国之后”的含义之一吧。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阿尔都塞与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

① Louis Althusser, *Initiation à la philosophie pour les non-philosophes*, Paris: PUF, 2014, p.374.

② [法] 路易·阿尔都塞：《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第306页。

③ Louis Althusser, *Les Vaches Noires*, p.200.